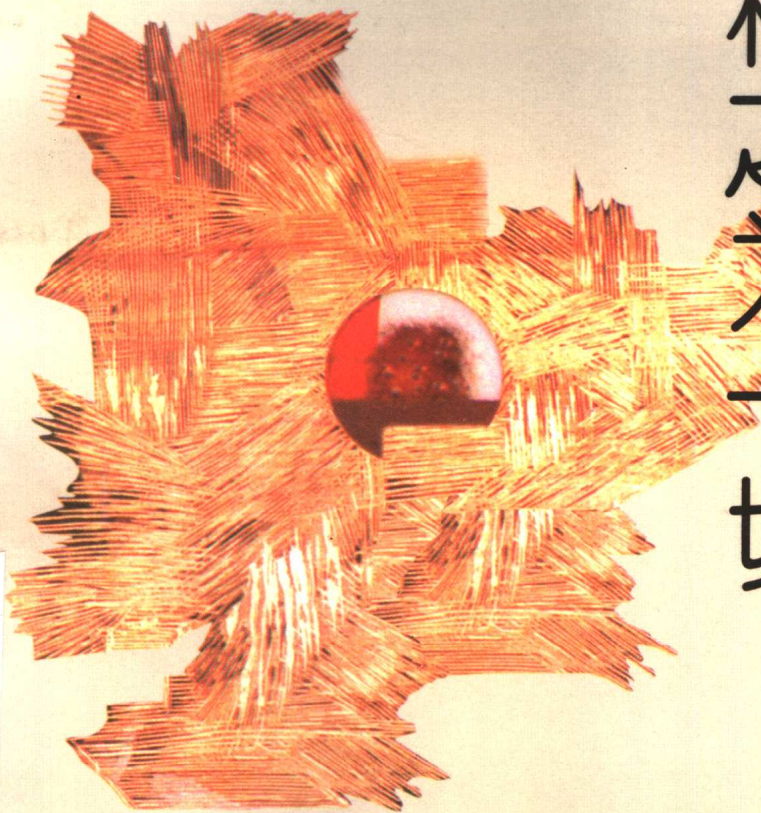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翟永明 集

称之为一切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

翟永明 集

称之为一切

唐晓渡/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称之为一切/翟永明著;唐晓渡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10

(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翟永明集/谢冕主编)

ISBN 7-5315-1767-2

I. 称… II. ①翟…②唐…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4677 号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4 千字 印张:7 $\frac{1}{2}$ 插页:2

印数:1—6 000 册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姊昕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5-1767-2/I·1545 定价:15.80 元



溪花与禅意
相对亦无言

1994 年摄于四川境内巴朗山顶



1995 年，在四川一教堂遗址。

与南京的朋友们一起
(左起：毛焰、韩东、朱文、
吴晨骏、刘立杆、李小山)。





小学时期。



1967 年，红小兵时代。

1967 年夏
纵马诺尔盖草原





1983 年写作《女人》
时，朋友高原所摄。

诗是对不可知世界和不可企及之物的永恒渴望。

诗是对已有词语的改写和已发现事物的再发现。

诗是一些人活下去的理由。人们驻足之处，正是诗人离开的地方。人们消灭时间，而诗人创造时间。

写作诗歌是一个等待奇迹发生的过程，我们所竭力要接近的那一时刻，是顺应天意的时刻。

诗永远是一种询问，越过词语，越过理智，越过美甚至越过死亡，把问号高高地挂在时间的额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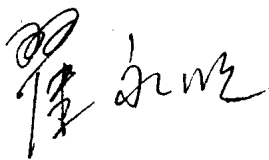
诗人必须唤起自己和读者的激情；而好诗人能控制这种激情。

一首好诗的价值在于：无论从何种角度或何种方式来看，它都仅仅是一首“好诗”而已。

诗人对文字情有独钟，它能在那些具有普通意义的字、词上发现至关重要的东西，那些文字音调上的抑扬顿挫会帮助他内心的秘密游戏和推演出不可捉摸的奇妙韵律。

诗人应该具备对词、语的超出常人的敏锐和理解力，还应该具备对自己和他人的作品的判断力，以及向神秘时刻开启的“天眼”。

诗人在为世界写下“谶语”时，也在自己的语言里“中谶”。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廖亦雄' (Liao Yixiong), written in a cursive, expressive style.

总 序

谢 冕

中国女诗人的创作有很长的历史，也出现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如李清照，她成为宋词婉约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词传诵至今，历久而不衰；又如朱淑真，她的准确生卒甚至不可考，而她的断肠词却令后人一唱三叹。在以男性为中心，且有很严格的封建体制的社会里，女性的才华只是缝隙中的一道微光，而且多半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在漫天的黑暗中带给人们以意外的惊喜。数千年来，中国女性用她们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想要打开窒息她们的青春和生命的黑屋，她们也用诗，但往往只留下一声声清婉的悲吟。女性诗歌是中国历史长天中的断续的雁鸣，装点着萧飒凄迷的无边秋景。

上一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烟迷漫的年代，忧患的驱使，外面世界的冲击，受到启蒙的一部分女性终于摆脱传统的桎梏，开始让自己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壁垒，聚焦于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方面。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从旧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途中成为诗人，但其目标也只停留在争取和男人扮演平等的角色上，几乎无暇顾及甚至而有意忽略性别的差异。秋瑾是这100年中出现的非常杰出的女性，她有很大的才情，也写很好的诗，但她宁愿让人们看到一位骑着战马、挥舞宝刀的豪侠的身影，而不是充



满闺阁情趣的才女。她最后为自己的理想捐躯，她的牺牲甚至比男人还要惨烈。

艰危的时势和动荡的政局，使千千万万女性从绣楼和客厅走上社会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人们也卸下脂粉裙钗，宁肯忘却自己的女儿身，和男人一样的在社会运动中驰驱。她们把诗神冷落了，这不是她们的过错。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谁都会这样做的，何况是那些充满诗情的、对痛苦的大地怀有深深挚爱的、敏感而细腻的灵魂！

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蓬勃的文学运动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争取和男人一样写作权力的女性的写作，而很少是在内涵上和女性的性别觉醒相联系，显扬仅仅属于女性自身属性的那些方面的女性诗歌。迄今为止，中国不曾有女权运动，因此，这些女性写作几乎很少和女性主义的潮流发生关联。

从一般的女性写作到我们此刻称之为的女性诗歌是质的递进。这恐怕是本世纪 70 年代结束社会动荡和思想禁锢之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战乱频仍，安定宁静的生活一直是中国人梦境中的向往。只是从 70 年代末起到现在，才出现了自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从未有过的、至少长达 20 年的战烟平息的和平环境。艰难时势造就英雄，动乱的年月恰好为男人的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时代也把机会平等地给了女人，但这都是以抹平女性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花木兰的故事，即是一例。

战乱的终结，终于为女性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而丰裕的境遇。人们戏称当今文学新时期是“阴盛阳衰”，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也在诗歌领域中，女性作家的创造力和总的成果超过了，至少是毫不逊色于男性作家。动荡年代瞬息万变，人们关注的是外部广阔的世界；和平岁月就不同了，人们有充分的可能性回到自身、回到细部，这时，女性的细微、敏感、温婉和深切，顿然使文学的天地辉煌灿烂起来。

从中国新诗史来看，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女性诗歌，其业绩的展现是断续而不连贯的，且未形成大的格局。集团式地大批涌现，量与质并重而高水平的突起，则是晚近20年间的事。这从全局来看是如此，若把视点集中于每一个女性诗人上，其笔下涌现的，更是多姿多彩，丰富而厚重。这些诗，除了继续和中国特殊的生存环境保持联系外（这是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如此的），更把诗的触角伸延到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层面上。我们从这些诗人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传统的诗人对于自己的家园、土地、社会的关怀，还看到在新的环境中生长的女性对于她们处身其中特殊的文化境遇的思考和把握，并以她们特有的直觉与感性的方式予以表达。这样的女性诗歌，当然是在形式上和内涵上较之以往有了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拓展。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坚卓，无论是对照古典诗歌的长河，还是相比于新诗前60年的进程，都无疑是一次“创世纪”意义的拓殖。她不仅以其与当代男性诗歌同步并进的规模和成就，充填了一个巨

大的历史空缺，且以其富有朝气的新鲜质素和非凡的表现，拓展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空间与艺术空间，也为汉语诗歌加入到世界文学格局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一宏大的女性诗歌进程，或可更影响到整个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未来之发展——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豪和欣慰！

从阅读到研究，从个在到整体，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均已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效应，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之梳理与整合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是至今为止，虽然已有不少这方面的选本问世，但依然缺乏一次高水准、集约性的展示。基于这样的思考，也基于以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实力的估价，一个宏大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的构想就此形成。参加这一文库编选工作的是国内一批卓有建树的诗歌批评家，更得以多年来在新诗出版方面享有盛誉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斥巨资隆重推出。这样，这套以规范化的体例和体系的规模所成就的诗歌文库，向读者展示的，就不仅是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实绩，也是代表着当代高水准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出版的实绩；以此作为对整整一个时代的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检视和总结，也期望由此对未来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产生强力的推动和久远的影响。

1996 年 12 月 1 日于北大

谁是翟永明？

唐晓渡

这当然不是在明知故问。我质疑的并非是现实中的某位女性，而是某位诗人；尽管二者使用了同样的符号，却不应混为一谈。可是，作为诗人的翟永明难道不是和现实的翟永明一样确凿吗？由于与之对应的是一系列作品，她难道不是更不容置疑，更具有独一无二性吗？未必。在涉及对具体诗人的评价时，往往会发生某种类似诗歌修辞中的“借喻”或“转喻”现象；换句话说，喻体成了主角，而喻本却退隐其后。事实上，1983年最早介绍我和翟永明认识的朋友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们四川的小舒婷”。他热情地向我推荐当年《星星》诗刊隆重推出的翟永明的一个大组诗：“你好好读一读，就会知道此言不虚。”

没有人会怀疑这位朋友的善意。然而，正是这样的善意使一个诗人成了另一个的“副本”，而这个“副本”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强化或放大其“正本”聊尽义务。自然，那时翟永明还没有写出《女人》和《黑夜的意识》，还没有



成为“女性诗歌”的“头羊”和“重镇”，因此尽一尽义务也无妨；但此后的情况又如何呢？

1986年我写了《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一文。据我所知，这篇首先评论《女人》的文章也最早涉及了“女性诗歌”的话题。这么说倒不是要标榜自己有“为风气先”之功，而是意在将它当作一个案例，以揭示有关“女性诗歌”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这篇文章有一个黑格尔逻辑学式的开头：“当我想就这部长达二十首的组诗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正在试图谈论所谓‘女性诗歌’”；接下来我描述了“在一个远非公正而又更多地由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性诗人似乎更不容易找到自我，或者说，更容易丧失自我”的种种现象，然后试图给“女性诗歌”下一个可能的定义：“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摒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在文章的结束，我如此概括《女人》的意义：“如果说翟永明是通过‘创造黑夜’而参与了‘女性诗歌’的话，那么可以期待，‘女性诗歌’将通过她而进一步从黑夜走向白昼。”

整整 10 年后,在“女性诗歌”似乎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女性诗歌”的队伍也早已蔚为大观的背景下重读这篇文章,我发现我犯了和那位朋友相似的错误:无论当时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可以指望在具体论述中得到什么样的补偿,当我试图把所谓“女性诗歌”表述成一个孤立存在的、高高在上的运动主体时,我实际上也使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喻体”;在这个新的“喻体”面前,不仅翟永明,几乎所有适合讨论的对象都有可能成为另一意义上的“副本”或“注脚”。这个错误由于在试图给出关于“女性诗歌”的定义时缺少更有效、更充分的诗学考虑,并且仅仅以“男性成见”为唯一参照而显得格外不可原谅。现在问题已变得足够清楚:正如在反观并重构任何思想、文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的发展历史时会发现的,当我们反观并重构“女性诗歌”迄今的历程时也会发现,“与作者和作品那种坚实而根本的单位相比,这些思想、流派、潮流反而变得相对脆弱、次要并成为附属的了”^①。在读到翟永明以下的一段话时,我庆幸我后来没有再就“女性诗歌”发表更多的看法,因而不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因此才谈到一种可能的“女性”的文学。然而女性文学的尴尬地位在于事实上存在着性别区分的等级观点。“女性诗歌”的批评仍然难逃政治意

义上的同一指认。就我本人的经验而言，与美国女作家欧茨所感到的一样：“唯一受到分析的只是那些明确讨论女性问题的作品。”尽管在组诗《女人》和《黑夜的意识》中全面地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但我却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之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事实上“过于关注内心”的女性文学一直被限定在文学的边缘地带，这也是“女性诗歌”冲破自身束缚而陷入的新的束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女性诗歌”即“女权宣言”的简单粗暴的和带政治含义的批评模式，而真正进入一种严肃公正的文本含义上的批评呢？事实上，这亦是女诗人再度面临的“自己的深渊”^②。

在某种程度上翟永明恐怕言重了。就我视野所及，似乎并没有哪篇文章“简单粗暴”到把“女性诗歌”直接等同于“女权宣言”的地步，更谈不上这样的“批评模式”了。事实上，正如引进女权主义理论并没有导致一场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而几乎所有的女诗人都否认（或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像模像样的当代女权主义诗歌批评。或许是不得已，或许是缺乏相应的兴趣，或许是出于更复杂的历史原因，诗人和批评家们几乎是台谋式地悬置了，至多是曲折表达了“女性诗歌”